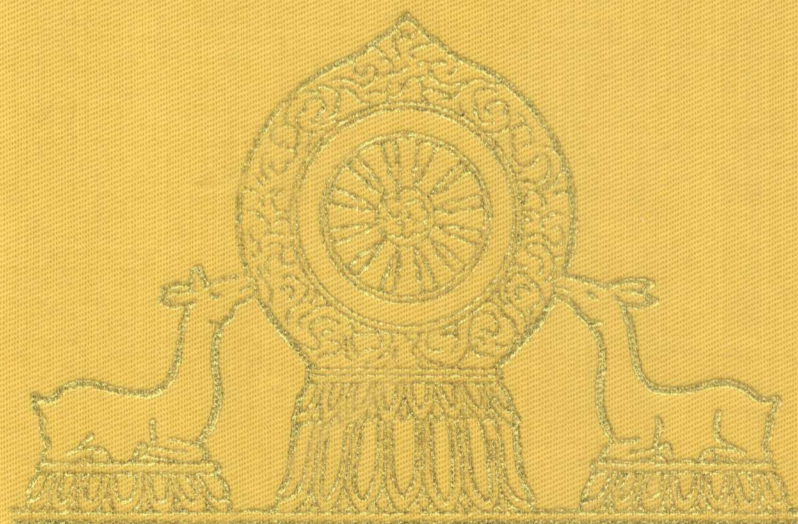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敦煌藏文文獻

ལྷ་རན་སེའི་རྒྱལ་གཉེར་དཔེ་མཛོད་ཁང་དུ་ཉར་བའི་
རུན་ཉང་བོད་ཡིག་ཡིག་ཚགས།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ཨ་ཤི་རུ་འཕགས་པུ་ཨ་ཤི་རུ་འཕགས་པུ་
ཨ་ཤི་རུ་འཕགས་པུ་ཨ་ཤི་རུ་འཕགས་པུ་

K870.6
200815
1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敦煌藏文文獻

①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0001—0046

主編
金雅聲 郭恩

編纂
西北民族大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國國家圖書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06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1/
法國國家圖書館, 西北民族大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5
ISBN 7-5325-4454-0

I.法... II.①法...②西...③上... III.敦煌學—文獻 VI.K87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51806 號

法國國家圖書館底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圖版版權© 法國國家圖書館
文本版權© 西北民族大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

དཔར་ཁང་།

ཉང་ཉེ་གཞན་ཆང་པར་ལས་ཚད་ཡོད་ཀྱང་སྤྱི་
ལཱ་རྒྱུ་སྤྱོད་ཀྱི་ལཱ་གཞན་དཔེ་མཛོད་ཁང་གི་ལྷན་ཚོགས་ལ་
པར་དབང་མ་ཐོབ་པར་བསྐྱར་དཔར་བྱེད་མི་ཚོགས་
©ལུ་བ་བྱང་མི་རིགས་སློབ་ཁྲིམས་ཚུན་ལོ།
©ཉང་ཉེ་དཔེ་རྙིང་དཔེ་སྐྱུག་ཁང་།
ལྷ་རྒྱལ་སྤྱི་ལཱ་གཞན་དཔེ་མཛོད་ཁང་བཅས་ཀྱིས་བསྐྱོད་གསལ།

Plates Copyright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Texts Copyright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①

編纂

西北民族大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國國家圖書館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號

郵編 200020 傳真 (86-21) 64339287

網址: www.guji.com.cn

電子郵件: guji1@guji.com.cn

易文網: www.ewen.cc

印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1/8 印張: 40 插頁: 54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1—250

ISBN 7-5325-4454-0/K.878

監 製

謝玉傑 王興康

學術顧問

王堯 多識 陳踐 華侃

主 編

金雅聲 (中國)

郭 恩 (法國)

副主編

束錫紅 才 讓 府憲展 (中國)

蒙 曦 (法國)

編 委

謝玉傑 金雅聲 王興康 趙德安 王立翔 閔文義

束錫紅 才 讓 府憲展 塔哇扎西當知 葉拉太 劉景雲

責任編輯

劉景雲 袁欣瑜 吳長青

裝幀設計

嚴克勤

彩圖攝影

吳 健 府之晨

ལྷ་རན་སིའི་རྒྱལ་གཉེར་དཔེ་མཛོད་ཁང་དུ་ཉར་བའི་
དུན་རྟོང་བོད་ཡིག་ཡིག་ཚགས།

①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0001 — 0046

གཙོ་སློབ་པ།

ཅེན་ལྷ་མིན། ལོ་ཨིན།

སློབ་སྦྱོར་ལྟེ་ཁག

ལུ་བ་བྱང་མི་རིགས་སློབ་གྲྭ་ཆེན་མོ།

མུང་ཉེ་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ལྷ་རན་སིའི་རྒྱལ་གཉེར་དཔེ་མཛོད་ཁང་བཅས་ཀྱིས་བསྐྲིགས།

མུང་ཉེ་དུས་རབས་པར་སྐྱུན་མ་རྒྱུ་ཚད་ཡོད་ཀྱང་སི།

མུང་ཉེ་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༢༠༠༤ལོར་མུང་ཉེ་ནས།

ལྷ་ཞིབ་པ།
ཞལ་ཡུལ་ཅེ། མང་ཞིན་ཁང་།
སྒོ་འདྲི་ས།
དབང་རྒྱལ། རོར་ཞིག་དོང་རྒྱལ་སྒྲེམས་སྒོ། བསོད་ནམས་སྦྱིད། ལྷ་ཁན།

གཙོ་སྒྲིག་པ།
ཅིན་ཕུ་ཤིན། (ཡུང་གོ)
ཁོ་ཞིན། (སྤྲ་རན་སི)
གཙོ་སྒྲིག་པ་གཞོན་པ།
མཉུ་ཞི་རུང་། ཚེ་རིང་། མཉུ་ཞན་ཤན། (ཡུང་གོ)
ལུན་ཞི། (སྤྲ་རན་སི)

སྒོ་སྒྲིག་ལྷ་ཡོན།
ཞལ་ཡུལ་ཅེ། ཅིན་ཕུ་ཤིན། མང་ཞིན་ཁང་།
ཤལ་རྒྱུ་ཞིན། མང་ལེ་ཞང་། མེན་རུན་ཡུལ།
མཉུ་ཞི་རུང་། ཚེ་རིང་། མཉུ་ཞན་ཤན།
མཐའ་བ་བཤ་ཤིས་དོན་འབྲུབ། ཡུལ་རྩ་ཐང། ལེའུ་ཅིན་དབྱིན།

དཔེ་སྒྲིག་འགན་འཁུར་པ།
ལེའུ་ཅིན་དབྱིན། ཡོན་ཞིན་གཡུ། བའུ་ཁང་ཚེན།
མཛེས་རིས་རྒྱས་འགོད་པ།
ཡན་ཁུ་ཚེན།

དཔར་ལེན་པ།
བའུ་ཅན། མཉུ་ཤི་ཁུན།

DOCUMENTS TIBÉTAINS DE DUNH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①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0001 – 0046

RÉDACTEURS EN CHEF

Jin Yasheng Monique Cohen

ÉDITÉS PAR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Université des Nationalités du Nord-ouest
Les Éditions des Classiques chinois, Shanghai

LES ÉDITIONS DU SIECLE, S. A., SHANGHAI
LES ÉDITIONS DES CLASSIQUES CHINOIS, SHANGHAI
Shanghai 2006

DIRECTION

Xie Yujie Wang Xingkang

CONSEILLERS

Wang Yao Dorzhigdongdrugsnyemblo Chen Jian Hua Kan

RÉDACTEURS EN CHEF

Jin Yasheng (Chine)

Monique Cohen (France)

RÉDACTEURS EN CHEF ADJOINTS

Shu Xihong Tshering Fu Xianzhan (Chine)

Nathalie Monnet (France)

COMITÉ DE RÉDACTION

Xie Yujie Jin Yasheng Wang Xingkang Zhao De'an

Wang Lixiang Min Wenyi Shu Xihong Tshering

Fu Xianzhan Mthababkrashisdonvgrub Yullhthar Liu Jingyun

RÉDACTEURS

Liu Jingyun Yuan Xinyu Wu Changqing

COUVERTURE

Yan Keqin

PHOTOGRAPHES

Wu Jian Fu Zhichen

TIBETAN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①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0001 – 0046

EDITORS IN CHIEF

Jin Yasheng Monique Cohen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06

SUPERVISORS

Xie Yujie Wang Xingkang

CONSULTANTS

Wang Yao Dorzhigdongdrugsnyemblo Chen Jian Hua Kan

EDITORS IN CHIEF

Jin Yasheng (China)

Monique Cohen (France)

VICE EDITORS IN CHIEF

Shu Xihong Tshering Fu Xianzhan (China)

Nathalie Monnet (France)

EDITOR COMMISSION

Xie Yujie Jin Yasheng Wang Xingkang Zhao De'an

Wang Lixiang Min Wenyi Shu Xihong Tshering

Fu Xianzhan Mthababkrashisdonvgrub Yullhthar Liu Jingyun

EDITORS IN CHARGE

Liu Jingyun Yuan Xinyu Wu Changqing

COVER DESIGNERS

Yan Keqin

PHOTOGRAPHER

Wu Jian Fu Zhichen

序 言

金雅聲

西北民族大學校長

二十世紀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劇烈動盪的時期，也是中國文物考古獲得殷墟甲骨、居延漢簡和敦煌、吐魯番、黑水城文獻的重大發現的時期。1900年敦煌藏經洞打開，發現了大約40000件寫本、刻本和藝術品，其中包括四至十一世紀的漢文寫本和八至九世紀的藏文寫本，以及回鶻文、粟特文、龜茲文、于闐文、梵文、希伯來文寫本等。涉及到從北朝、隋唐、五代宋初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宗教、科技、醫藥、曆法、文學、藝術、音韻、民俗等等當時的人文學科幾乎所有方面。但是，由於中國的積貧積弱，以及落後於西方的社會進程，在短短十多年時間裏，數萬件珍貴的古代文獻文物流落到英國、法國、日本、俄國、德國等地。從此開始，中國學術精英就遠涉重洋，開始了漫長的抄錄、攝影、研究出版的歷程。此中辛酸，誠為中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幫助支持下，以英藏、法藏、俄藏敦煌西域漢文文獻出版為標誌，大批流失海外文獻通過出版形式回歸祖國，促進中國的相關學術研究大步趕上了已經領先百年的西方和日本，呈現出波瀾壯闊浩浩蕩蕩的場面。但在此十數年中，中國的整理出版工作主要集中于漢文文獻；對藏文和西域文獻，特別是民族古文字文獻，還關注不夠，尤其是最大宗的敦煌古藏文文獻仍然不易為國人所見。

所謂古藏文文獻，是指吐蕃時期的藏文文獻。吐蕃滅亡以後，動亂百年，經籍文書盡毀，而現在所見大多是宋元以後重新集結起來的。幸虧早期從松贊干布開始七至九世紀的大約10000件藏文寫本保存在敦煌藏經洞中；同樣也非常可惜，這些獨一無二的藏文資料於1906—1908年分別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劫往英國和法國。中國學者通過縮微膠卷和外國出版物的發佈，才得以艱難地進行研究工作。而到現在，繼全面出版流失海外的漢文文獻之後，藏文文獻以出版形式全面回歸的時機終於到來了。

西藏早期文化與文字

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同胞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主要成員之一，西藏歷史和文化也是中華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歷史和文化的發展也就自然而然地表現出多元化和不平衡性。

早在遠古時期，西藏先民就製作了大量的細石器工具用於生產勞作，創造了燦爛文明。但是西藏文字的產生，卻是在公元七世紀。藏族的民族英雄和偉大政治家、軍事家松贊干布（？～650）在七世紀統一了西藏，並同唐朝建立起密切的關係。特別是以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聯姻為代表的唐蕃和親政策，對於加強藏漢民族的聯繫，促進西藏經濟文化的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

據幾部重要藏文史籍記載：藏族原無文字，松贊干布派遣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學習梵文和佛法。他學成之後返回吐蕃，遵照法王旨意，據梵文創立了藏文。屯米桑布扎從梵文的34個輔音字母中，剔除藏語語音中沒有的11個音素，又據藏語語音發音的實際情況增補了7個，製定了30個藏文的輔音字母。又從梵文的16個元音字母中，選出4個與藏語相符的，設計了4個元音符號。他根據

梵文蘭查字母創制了藏文正楷，又根據烏爾都字母創制了草書，並用藏文寫下了 8 種文法書，翻譯了《寶雲經》等 20 餘部梵文佛教經典。

藏文從創制到十五世紀初葉的 800 多年間，有三次重大修訂。第一次厘定，是在贊普赤松德贊執政以後，為了改進藏文，命噶、焦、湘三位譯師厘定藏文，統一佛學名詞等。第二次厘定，是在贊普赤祖德贊執政時期（815—836）。譯師們主要是統一佛經譯語和簡化正字法，以適應語音變化、文字規範和使佛經通俗易懂的要求。當時還編寫了《語合》二卷和大、小《翻譯名義集》等語法修辭和字典一類的工具書。《丹珠爾》雜部的《語合》二卷裏收錄了這次厘定譯語的法令全文和厘定譯語的詞目。這次藏文厘定工作得到了吐蕃贊普的支持，以法令形式強制推行，取得較大成效。現行藏文基本上與這次規範後的藏文相同。這次文字厘定也成為鑒別古今藏文的重要標誌。第三次厘定，是在吐蕃王朝分裂後，末代贊普達瑪之子奧松的時代在阿里地區建立了古格王朝，古格王益西奧執政時期，命大譯師仁青桑布對藏文進行了最後一次厘定。藏文經過三次厘定，更加完善，表述更為準確。

我國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吐蕃歷史文獻，產生於八至九世紀，和藏文的創建時期相近，直到九世紀吐蕃勢力退出敦煌為止。這批資料無疑是藏民族最早的文字記錄，記載了西藏從有文字以來的早期歷史即吐蕃歷史。敦煌古藏文文獻總量將近 10000 件，以此為對象的研究，對於全面瞭解西藏歷史，詮釋藏族文化，認知藏漢文化的雙向交流，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另外，敦煌藏經洞文獻中還保存有一些吐蕃統治結束後歸義軍時期的古藏文文獻，對於研究九至十一世紀河隴西域的歷史、文化也有重要價值。

伯希和獲取敦煌藏文文獻的情況

英國的斯坦因和法國的伯希和分別在 1906 年、1908 年從敦煌劫掠的文獻，分別收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關於法國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獲取文獻的情況，在其報告、書信、筆記、回憶錄中都有詳細的紀錄。

1908 年 2 月末，伯希和最終進入了著名的“藏經洞”。他從 3 月 3 日起，立即著手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準確而又系統地為文獻和畫卷編目，於 3 月 26 日才結束這項工作。一幅著名的照片，顯示他跪在一張小桌子前面，正在閱讀一份卷子。我們通過其日記而獲知，他是按照某種“有時連續十小時”的方式工作的，耳室中那不流通的空氣導致他陣陣劇烈咳嗽¹。

“當我置身於一個在各個方向都只有約 2.5 米、三側均佈滿了一人多高、兩層和有時是三層厚的卷子的龕中時，您可以想像我的驚訝。數量龐大的一批用繩子緊繫在兩塊小木板之間的藏文寫經堆積在一個角落裏。在其他地方，漢文和藏文字也從繫捆的一端露了出來。我解開了幾捆。寫本多是殘卷，或首尾殘缺，或中間腰斷，有時僅剩下一個標題了。但我解讀出的幾個，時間卻都早於十一世紀。從這種初步探測開始，我便遇到了一部婆羅謎文的貝葉經裝式經文，還有另一部回鶻文經文的幾頁文字。我於是便迅速作出了決定，必須至少是簡單地研究一下全部藏書。我應該在此完成這項工作。從頭至尾地展開收藏於此的 15000—20000 卷文書²，這是無法想像的，我即使用六個月的時間也無法完成它。但我必須至少是全部打開它們，辨認每種文獻的性質，看一下在何種程度上能有幸為我們提供新文獻。然後將它們分成兩部分，其一是精華和高級部分，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讓他們出讓的部分；另一部分是盡量爭取獲得、然而在無奈時也只能放棄的部分。

儘管我非常勤奮地用功，這種分堆還是用了我三個星期的時間。前 10 天，我每天要拆開近 1000 捆卷子，這應該是創下一種紀錄了：每小時打開 100 卷，跪在一個小龕中，用賽車一樣的速度工作。我後來放慢了速度。這首先是由於我有點累了，文書捆包中的灰塵嗆喉嚨；其次是由於我那購買文書的談判也激勵我去贏得時間，否則就只會失去它們了。一項如此倉促的工作，當然是帶有某種僥倖地進行。我可能會漏掉某幾件文書，或者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會把它們占為己有的。然而，我仍不認為忽略掉了任何最重要的東西，不僅僅對於一份卷子如此，而且對於一頁破爛紙也如此，上帝才知道這堆破紙片中是否會有什麼東西，只要它們未經過我的手，我就不能排除有我需要的東西的可能性。”

關於藏文文獻的獲取和重要價值的認識，伯希和說道：“藏文卷子在藏經洞中出現得比婆羅謎文或回鶻文卷子要多得多。我把它們全部放在一邊，一共近 500 公斤的寫本，可以上溯到藏傳佛教

的前四個世紀。但我害怕不能全部獲得它們。……很明顯，擁有一套比我們所知道的歐洲擁有的全部《甘珠爾》更要古老很多的該經書，無論如何也是很有意義的。我不記得在我們的圖書館中，是否收藏有柏林博物館那些可以上溯到十五世紀初葉的和已散頁的幾卷之前的《甘珠爾》。千佛洞的《甘珠爾》最晚也是十世紀的，而且更可能是九世紀。因此，它與非常古老的寫本一樣，並同時向我們提供了為譯經斷代的下限時間。我沒有放棄這部分文書，我的堅持可能會取得勝利。無論如何，這 11 大本‘夾板’並不代表藏經洞中的全部藏文卷子，而且還差得遠著呢！我幾乎可以確信，自己更容易成功地獲得其餘者。其他部分是由獨立的文獻組成的，寫在粘貼在一起並捲起來的長卷子上，或者是真正的卷子；也有的是用很厚的和不帶光亮的紙製成的寬貝葉經式的紙頁上，這是常用的吐蕃方式，但卻被捲了起來以捆成劄。所有這一切都發出了一種古老香料的香味，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那裏只收藏有嚴格的宗教文獻。然而，那些單獨的寫本、獨立的短文，它們提供了獲得更多具有新鮮內容的文獻的機會。它們更應該是一些個人的劄記、帶斷代的題跋，而不是《甘珠爾》那樣嚴肅的和一次性形成的文集³。”

在伯希和回到巴黎，開始組織對所有文獻編目的時候，將 0001—2000 號的號碼留給了藏文編號，而漢文文獻則從 2001 號開始編號。由此可見伯希和這位東方學大師對於這批古藏文文獻的認知和重視。後來，由於藏文文獻的總量超出預留 2000 號的一倍，編目者不得不另起序列單獨編定，藏文編號 Pel.tib. 總為 4000 餘號。此後，在拉露等人編目研究的過程中，將已經編入漢文文獻的藏漢雙語文獻從漢文序列 Pel.chin. 中抽出，重新賦予藏文文獻編號，哪怕有些雙語文獻僅僅有一行或者幾行藏文批註。也由此可見東方學家寧可將以漢文為主體的文獻歸屬到藏文文獻中，足見對於古藏文和吐蕃歷史文化的興趣甚至偏好。

在將近 100 年以後的今天，國際學術界對於藏經洞文獻的認識已經遠遠超出了伯希和當時的直接感受，以及拉露等編寫注記目錄時的主觀態度。這種新的認識無疑是建立在這樣的數據基礎上：在全部藏經洞流失文獻中，藏文文獻的數量達到 10000 件左右，幾乎和漢文文獻的數量相當。當我們討論漢藏文化的時候，當我們討論敦煌陷蕃和歸義軍的時候，當我們研究藏經洞性質的時候，我們忽然發現，對於藏經洞中幾近一半的藏文材料，我們還只是略有所知、甚至一無所知。我們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半個藏經洞範圍。對另一半材料的解讀中，會發生、發現一些什麼，當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事實上，當我們開始著手接觸這些古藏文材料的時候，我們已經不斷有所發現，已經看到了一片廣闊的天地。

法藏古藏文寫本與國內外研究現狀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內收藏的敦煌文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主要包括了伯希和從莫高窟獲取的漢文文獻 4000 多件，藏文文獻 4000 多件，還有其他粟特、龜茲、回鶻、西夏文文獻等。文獻來源一部分是來自藏經洞，即五至十一世紀寫本；另部分來自莫高窟北區石窟，約為十一至十三世紀寫本。其中特別是出於藏經洞的材料，大多屬於吐蕃佛教的前弘期，是中古民族文化興廢繼絕的重要文獻。也是我們研究西藏文明史、漢藏關係及吐蕃統治時期各個方面的主要參考文獻。

法國漢學界是海外敦煌學的一個重鎮，既有伯希和所獲取的豐富藏品，又有雄厚的研究傳統，從沙畹以來的漢學大師，如伯希和、馬伯樂、戴密微、謝和耐，以及藏學、中亞學的頂尖人物，都對敦煌學有或多或少的貢獻。上個世紀 70 年代以來法國科研中心敦煌學研究組的成員，發揮集體的優勢，陸續編輯出版了《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和五本敦煌學論文集。

法國拉露小姐 (1890~1967)，曾研究過藏文佛經及《〈甘珠爾〉目錄》等。後任巴黎大學教授。她終身未婚，以畢生精力對伯希和運到法國收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敦煌藏文寫卷進行整理編目。《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錄》，共編成三大冊（是選編而不是連續編號），第一冊 (1~849 號)，1939 年出版；第二冊 (850~1282 號)，1950 年出版；第三冊 (1283~2216 號)，1961 年出版。這部目錄為各國學者研究敦煌藏文寫卷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漢學大師戴密微《吐蕃僧諍記》根據 P.4646 號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決》為主要材料，參考了敦煌藏文文獻，還原了 792~794 年漢地僧人和西藏僧人關於禪宗頓漸體驗的一場論戰，最後失敗一方退出藏地的重要史實。

我國古藏文文獻研究概況

我國藏學研究的先驅于道泉先生早在上個世紀 30 年代初負笈巴黎就學時就注意到這些文獻的重要價值，且受當時北平圖書館的委託，謀求對這些文獻進行複製、攝影，以期攜歸國內供國人研究，但由於受到管理人員的掣肘，願望一直未能實現，只能臨淵羨魚，以致國內學人長期無緣從事研究。1961 年，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就建議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把英國國家圖書館印度事務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膠片也收購進來，但限於當時的條件，陳先生的建議未能實行。

其後，王堯、陳踐先生合力開展了全面的研究，切入點就是法國學者巴考等著《敦煌吐蕃歷史文書》（1940 年版）和法國科學院與巴黎國立圖書館合作影印的兩鉅冊《法藏敦煌藏文寫卷選刊》（1978、1980 年版）。《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共存三件，編號分別為 P.T.1289、S.T.750、Or.8212-187，用編年的形式記錄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會盟、狩獵、征戰、稅收等，是研究吐蕃歷史最重要的文獻之一。王堯、陳踐合力將其譯為漢文發表。

近年，由王堯主編，陳踐、褚俊傑、王維強、熊文彬參編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也得以問世⁴，公佈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目錄，計有編號 4450 個，含 3375 個卷號。這是研究古代藏族文獻很有價值的參考書。

除藏文外，敦煌還出土有一大批與吐蕃密切相關的漢文文獻，他們與藏文文獻一樣，對於吐蕃史和漢—吐蕃關係史來說，無論就歷史、地理，還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學，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資料。于道泉、王重民、向達諸先生都曾對此花過心力，在海外訪問、研究期間，孜孜不倦搜集、抄錄，作過報導。上海古籍出版社從 1994 年至 2005 年編輯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總共 34 卷中，就包括了伯希和的全部漢文、粟特文、于闐文搜集品，其中還包括了許多吐蕃時期的漢文文獻，以及被同時編入“Pelliot tibétain”序列的漢文文獻。

本書編輯出版的意義和過程

隨著敦煌、吐魯番、黑水城文獻的發現，出土文獻的多樣性已經極大地超越了傳統文獻學和佛、道等專題文獻學確定的範疇。對這些大宗新材料的研究方興未艾。雖然敦煌、黑水城的文獻發現已有百年左右，但是由於國人長期不能看到資料，仍然是相對新穎的國際顯學。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⁵。”

以敦煌藏經洞傳世最為集中、最大數量、最具學術含量的法藏、英藏敦煌古藏文資料為典型材料，結合同時流失的漢文文獻和其他文種的文獻，以及金石碑刻、出土簡牘文獻等，深入、全面研究自松贊干布創制吐蕃文字並記載吐蕃王國早期社會歷史文化生活的客觀狀態，將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藏民族具有豐厚優秀的文字、文化傳統，在唐代創制文字之後，吐蕃王朝留下了無數的寫本文獻和大藏經，是我國文化建樹最多、成就最大的少數民族之一。對於藏民族吐蕃時期開始有文字記載的史料的研究，可以充分論證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西藏和內地政治、文化、經濟等多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學習，是藏漢民族關係的主旋律。藏漢和親、甥舅之誼，以及文化社會的共生共榮、唇齒相依，形成了血肉相聯的關係。

近年來，國家十分重視藏學研究和藏學文獻的出版，撥出鉅資進行藏文大藏經即《甘珠爾》和《丹珠爾》的對勘工作，這是十分必要、意義重大的民族文化建設項目。相比之下，整理出版海外敦煌藏文和其他文種如回鶻文、梵文、于闐文、龜茲文、粟特文等文獻資料，更有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和深遠意義。其原因是：一是資料大部流失在國外，由於各種政治或人事原因，整理出版的機會稍縱即逝；二是科研十分需要，國內研究目前主要依靠國外已經發表的圖版和成果，即使這樣也很難看到。三是價值重大、不可或缺，這些材料年代貫穿於五至十世紀，歷史悠遠；四是涉及領域廣闊，遠遠超出通行佛教經籍的範疇，包括了大量的社會歷史文書，尤其是早期西藏歷史、吐蕃與中原關係史等最早最直接的資料；五是涵蓋多民族多語種的不同時代的信息，具有多元的文化價值。

英藏、法藏藏文文書，長期以來一直是研究八至十世紀中原和吐蕃歷史的最主要的資料，可惜國內目前僅僅有王堯等編纂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目錄，英藏敦煌藏文文獻則還沒有完整的目錄；學者們一般無緣對具體文獻進行直接研究。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等單位購買了法國的縮微膠卷，但是當時製作時就已缺失很多，其他單位更難看到。即使國外的研究也主要依靠縮微膠卷，尚沒有完整的紙面出版物行世，受到很大的限制。從西方著重於文字學、語義學的傳統來說，民族古文字資料研究一直是熱點。將全部英藏、法藏藏文文獻研究、整理、出版，更是我國幾代藏學專家夢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

從2004年起，西北民族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開始聯絡英國、法國國家圖書館，準備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民族古文獻。在2005年初得到兩國圖書館的響應，並且在國際敦煌項目(IDP)第六次會議(北京)期間，和兩國圖書館負責人商談，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分別簽署了合作編纂出版的意向書即實施細則。2005年4月，西北民族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召開“海外民族文獻研究出版會議暨簽約儀式”，邀請在京的中國敦煌學家和藏學家、民族語文學家約30人，討論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和其他流失海外民族文獻的研究出版工作，共商敦煌藏文文獻編纂出版盛舉，共謀研究、編輯、出版大計，聽取各界專家的寶貴意見建議，得到了與會人員的高度評價和大力支持。西北民族大學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簽定了合作編纂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協議。

與會的敦煌學專家和藏學專家一致認為：通過出版形式回歸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獻，第一個階段是整理出版敦煌漢文文獻，可謂第一個里程碑；第二個發展階段，或者說第二個里程碑，就是整理出版民族文獻，其中最大宗的是藏文文獻。它的整理研究出版，可以帶動起一大批專家學者，興起新一波研究浪潮。出版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古代民族文獻，對於整個的民族文化，對整個中古歷史研究，對於我們多民族的自身認識和親和認同，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過去材料和研究優勢都在國外，我們常常要通過外國的研究成果來認識自己民族的歷史，那是迫於無奈；而今國運強則文運盛，希望能夠開創研究出版海外民族文獻的新篇章。搶救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獻是全國各民族的一件大事，從規模上講不是個別的而是全面的搶救回歸，從行為上講不是少數單位的偶然行為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從性質上講是一個綜合的全息的文化工程而不是簡單的影印出版。

通過與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合作，我們可以第一次最大可能地利用敦煌古藏文資料，對西藏早期文字形成和文化活動進行全方位的研究，並在研究的同時，考證、比定、公佈大量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獻，必將引起國際藏學界、敦煌學界、漢學界的密切關注。

現在我們欣逢盛世，國家昌盛，民族團結，使得過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都有了可能；同時，我們西北民族大學又適逢百年一遇的最好機會，獲得了整理研究敦煌藏經洞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獻的機遇，可以首次充分、自由地利用8000多件文獻進行研究，具備了幾代學人夢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最好的外部環境；西北民族大學具有50年藏語言文字文化教學研究經歷，和藏學相關的院系、學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培養造就了一大批老中青藏學人才，彙集了王堯、陳踐、多識、華侃等眾多藏學專家學者，吸引了有志於此的中青年師生參與整理研究，使之成為教學科研新的生長點，得到了中國敦煌學界、藏學界等知識界的廣泛支持，具備了最好的內部條件。為進行海外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學校成立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專司其事，組織藏學、史學、文獻學等各方面的專家，對海外敦煌藏文文獻進行編輯整理出版和研究，編輯工作精益求精、考訂工作慎之又慎，已取得初步的成果，並有所發現、有所創新。實踐證明，整理出版工作，對國際藏學研究作出了貢獻。一批中青年師生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古藏文的學習研究過程中。在王堯、陳踐、華侃等專家的輔導、幫助下，《古藏文辭典》、《敦煌古藏文研究論文集》、《敦煌古藏文研究譯文集》等一批相伴相生的重要學術成果也將應運而生。這對於推進國內外藏學研究以及提高學校的科研教學水準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全部法藏藏文文獻為Pelliot tibétain 0001-3358號，將編為8開本通欄或上下兩欄，總量約為10-15冊。本項目的首要任務是對每個古藏文寫本進行比定、定名，分別確認其文獻屬性，特別要闡發其對於文化歷史研究的價值。本項目對比傳世的文獻如《甘珠爾》、《丹珠爾》，確認其是否有其他傳本；對比《至元法寶總目》勘同其有無漢文譯本，並追溯其藏譯來源是梵文還是漢文；盡可能完整地搜集國內外期刊中對於某件寫本研究的鏈接論文；收錄翻譯所有題記，考訂年代和人

物、事件。在此基礎上編寫研究性的敘錄即“注記目錄”。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纂出版，是中國藏學界和敦煌學界的共同成果，也是中國學術界長期努力追求的必然結果。從于道泉先生開始到西方圖書館搜尋抄寫藏文寫本，到敦煌藏文文獻的全面編目，到大批優秀學術論文的發表，這種長期的如飢似渴的追尋，體現了對於完整出版敦煌藏文文獻的迫切需要，催生了海外民族古文獻的整理研究和編纂出版。同時，在本項目啟動伊始的論證階段，到研究定題編纂出版階段，都得到了有關專家的熱心支持。尤其是中國藏學專家王堯先生、多識教授、陳踐先生出任本書的學術顧問，對於古代藏文文獻的解讀和提昇學術研究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本書的出版還得到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主任郭恩女士的大力支持。郭恩女士是中國文獻學專家，撰寫有關中國雕版印刷史等多部著作。從1993年到2005年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編纂出版了伯希和漢文搜集品《法藏敦煌西域文獻》34冊，出版伯希和敦煌藏文文獻也是該項出版的自然延續；手稿部東方部主任蒙曦女士諳熟中國典籍，2005年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新館主持了《筆墨乾坤——中國歷代圖書展覽目錄 *Chine: L'Empire du trait*》的大型展覽，撰寫了全部展品的解題目錄 *Calligraphies et dessins du v^e au xix^e siècle* 並付出版。作為一個學者型的管理人員，她幫助聯絡複製部門，細末入微至乎開具帳單、查找資料、拍攝寄送等都無不親歷，體現了法國學者優雅負責的素質。法國遠東學院前院長戴仁先生和原敦煌小組的專家，以及法國遠東學院北京中心華瀾先生，都對我們的工作提供了各種形式的幫助。

西北民族大學地處絲綢之路、唐蕃交通的要塞蘭州。從學校背靠的五泉山登高一望，西北面是連接西域直至地中海的古代東西方交流的最主要通道，西南面是藏區最著名的拉卜楞寺和安多地區，而東面則是中華民族夏商周秦的發祥地。百年之前，無數的外國探險家在山下匆匆走過，帶走的是歷史的精髓、文化的瑰寶。“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到海不復回。”承載著無數憂患屈辱的母親河，已經不是昔日模樣，她是中華民族包括各少數民族文化的榮光，而今更閃耀著民族團結、事業繁盛的輝煌。當我們沿著黃河去追溯她的發祥地青藏高原的歷史的時候，黃河也將把我們搏擊風浪的船歌載入她的新的史冊。

2006年4月

- 1 莫尼克·瑪雅爾、旺迪埃-尼古拉：《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的內容與價值》，見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記》，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p319。
- 2 伯希和按照當時現場的直觀估計藏經洞文獻總量是15000—20000件，此前尚有斯坦因掠走10000件，另斷裂殘片將增加很多編號，最後運送至京師圖書館途中人為割裂充數又增加許多件。故敦煌文獻的編號總量大大超過伯希和所說的實際總量。
- 3 伯希和：《敦煌藏經洞訪書記》，見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記》，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p270—271。
- 4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民族出版社，北京，1999年。
- 5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p 236。

前 言

郭 恩

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主任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的出版已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而這項工作則是在 1992 年法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雙方達成一致性意見後開始的。從 1995 年到 2004 年，屬於伯希和中文收集品的手稿出版總量已達 34 冊。現在計劃出版的則是伯希和收集品內為數更多的藏文文獻。

巴黎的藏文文獻編號為 3358 號，在規模上超過倫敦所藏藏文而居於首位。這些內容涉及歷史、宗教、語言文字、藝術、星相占卜、科學技術、文學以及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因為這些關於中世紀高地亞洲的原始文獻材料是未曾經過加工的、發現于敦煌的手稿，即如石泰安教授所說“這些材料首次真正地揭示了西藏文明的起源，及吐蕃王朝時期的制度及思想的開始”。石泰安教授是繼巴考和拉露之後研究藏文文獻材料的先驅者之一。

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特別的藏文材料的影印本編輯出版。最典型的例子是《國立圖書館所藏藏文文書選刊》兩冊，這是於 1978—1979 年影印的眾所關注的原始材料，其內容僅僅包括 284 個編號。

1980 年由法國國家圖書館製作的伯希和藏文收集品的縮微膠卷，現分藏在全球各地的一些圖書館和研究機構內。然而，這些縮微膠卷不像出版物那樣可以給學者們提供相同的服務，即應使學者們在研究原始材料方面獲得新的門徑，以及由此進一步拓展對古藏文的研究：許多被影印的文獻資料仍有待探究，其他已經被研究的文獻資料則需再研究及再發現。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北民族大學共同決心的引導下，這項龐大的工程仍需花費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而這項工程同樣是伴隨著對其他語言如西夏文、回鶻文及粟特文等手稿的整理而進行的。

(法文—中文翻譯：吳長青)